

风骚论集

周秉高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风 骚 论 集

周秉高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风 骚 论 集

周秉高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1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32 印张:8.25 字数:202千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81015—550—4/I·57

定价:7.50元

自序

“风骚”，即《诗经》《楚辞》，先秦诗歌的杰出代表，中国诗歌史上两种主要不同创作方法的奠基作品。“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这是祖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应该继承，值得研究。

“风骚”研究，由来已久，论文专著，汗牛充栋。但是，今天，如果《诗经》学再不注重对古代研究成果的批判继承，只停留在“想当然”式的“译注”以及政策“图解”式的“赏析”之上；如果《楚辞》学不注重作品本身内容和价值的研究，继续纠缠于无意义的“斗嘴皮子”（姜亮夫先生语）之上，那么，瑰宝“风骚”只能作为古董陈列，在现实生活的大潮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不可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本小册子除论“风骚”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探讨“风骚”研究的方法问题。所收论文，大部分已经公开发表，另有6篇是在内蒙古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在职硕士研究生班上的学术演讲。从主观角度说，愿意认真地探讨一些问题，而究竟是耶非耶，还要请广大读者评判。

中国古代诗歌史话，是几年前应一家报纸的约请而写的，其中包含了自己研究先秦诗歌的若干心得，故亦选择12则收录于此。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七日

目 录

自序·····	(1)
《诗经》学——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	(1)
《毛诗正义》研究·····	(12)
《诗集传》研究·····	(31)
《诗经》鉴赏论·····	(41)
论赋诗断章的发展轨迹·····	(56)
《诗经》在先秦之作用再探·····	(67)
《关雎》二论·····	(84)
对当前楚辞研究的几点看法·····	(89)
楚辞研究史上的优良传统·····	(93)
论屈原爱国主义形成的原因·····	(105)
“兮”字与楚辞的音乐性·····	(123)
《天问》层次·····	(134)
屈原与黄棘之会有无关系辨 ——评《离骚》作于怀王二十五年说·····	(147)
《离骚》不可能作于顷襄王时代·····	(156)
评朱熹对《离骚》写作年代的改动·····	(163)
《哀郢》研究·····	(172)
屈原后期思想发展的一个低谷·····	(183)
《悲回风》二题·····	(191)

《招魂》写作时地新探.....	(203)
-----------------	-------

先秦七言歌诗选析

——兼论七言诗起源.....	(221)
----------------	-------

中国古代诗歌史话 12 则..... (233)

1. 最早的诗歌.....	(234)
2. “王官”与诗歌.....	(236)
3. 情歌与政治.....	(238)
4. 孔子与《诗经》.....	(240)
5. 战国时期的诗歌.....	(242)
6. 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	(244)
7. 屈原再次被逐记.....	(246)
8. 万山丛中的歌唱.....	(248)
9. 汨罗江上的悲剧.....	(250)
10. “阳春白雪”属宋玉.....	(252)
11. 中国第一首七言歌谣.....	(254)
12. 中国第一首船夫曲.....	(256)

(注:带“*”者,是在内蒙古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在职硕士研究生班上的学术演讲,故引文一般未注出处。)

《诗经》学——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

《诗经》，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中国书面文学史的滥觞。

《诗经》，中华古老文明的源头。

两千年来，研究者不断，著述浩繁，已经形成一门显学——《诗经》学。

《诗经》学，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先秦、汉唐、宋代、清代、现代。每个阶段都充满着斗争，又都各有代表。

先秦诗学（又称“诗说”）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诗三百”作为儒家的一门必修课，世代传授。在其过程中，对诗义的阐发，渐成系统。据说，经过孔子——卜商——曾申——李克——孟仲子——根牟子——荀卿——毛亨这八代沿袭，成为“毛诗训传”，而孔、孟、荀三家诗说，既有师承，又有区别，甚至斗争。

汉唐《诗经》学的代表人物是：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这数百年间，斗争激烈，或“申毛难郑”、或“申郑难王”，或复申王之说……其结果，产生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融贯群言，包罗古义”。

唐太宗的主观愿望是使《诗经》学“论归一定，无复歧途”。但由唐入宋，江山换代，诗学突变，斗争激化，疑古思辨之风大炽，攻序成为时尚。欧、苏、郑、王，相继出场，集大成者，乃朱熹《集传》。元明诗说，主要因袭宋儒，汉学亦有流传。

有清一代，政治原因，导致诸多学者埋头古籍，皓首穷经。诗学论争蜂起，汉宋、今古、新旧，相互攻诘，各有短长，但总体“意不在经”，“激过于当”。值得一提的是王夫之，姚际恒、方玉润和崔述等人，开始从文学角度研究 305 篇，真知灼见，时露笔端；然而经学羁绊，仍难挣脱。

真正彻底地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则是“五四”以后的事情。“古史辨”派的相互辩驳，切磋，便是这个潮流的开端。可惜，党八股一度横行，极左思潮长期泛滥，《诗经》学重新陷入泥潭，沼泽。

如何看待这一门古老的《诗经》学？

应该说，二千多年来的《诗经》学，是有它杰出成就的。首先，305 首诗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未被湮灭，至今活在广大炎黄子孙心中，至今仍在润泽着龙之传人的心理素质，这是自孔子以来无数研究者、传播者的一大伟绩。尽管他们的动机千差万别，未必正确，但客观效果如此，我们不应否定。其次，大量的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古代不少学者进行了周密考证，资料详赡，足资借鉴，我们应予尊重。第三、古人治诗，方法种种，固然荒谬之处不少，但智慧的火花也随时可见，有的分析，至今看来仍能给人启迪。所以，对于已有二千多年历史的《诗经》学，我们不能全盘否定。

当然，由于缺乏先进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由于诸多研究者出于一己或阶级、集团的私利，他们的研究，如前人说：“意不尽在经义”，往往“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矣。”我们可以把过去《诗经》学的偏颇、谬误归纳成以下三点：

第一、囿于阶级私利。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狭隘的阶级利益，硬把一部文学作品当成封建道德的教科书，视为“经夫妇，成孝敬，

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例如，他们是这样解释《关雎》一诗的：

言后妃虽悦乐君子，不淫其色，能谨慎贞固，居在幽闲深宫内，不妄淫褻君子，若雌雄之有别，故以兴也。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后可以讽化天下，使夫妇有别；夫妇有别则性纯子孝，故能父子亲也。孝子为臣必忠，故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既敬，则朝廷自然严正，朝廷既正，则天下无犯非礼，故王化得成也。

瞧，经过一连串的荒谬演绎，居然把一首描写青年男子热烈追求青年女子的民间情歌，硬说成能使“王化得成”的封建道德教科书，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而这样的解释在《毛诗正义》中却俯拾皆是。

第二，无视文学特点。文学作品是通过形象和典型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在作品形成过程中，已经不拘泥于个别人、个别事；在作品形成之后，就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然而，《毛诗序》作者却动辄简单地把诗篇比附为历史上具体的某人某事。如：“《绿衣》，卫庄姜伤己也”；“《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式微》，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这样的解释，就仿佛在说：《三国演义》是三国历史的介绍，《水浒传》乃宋江起义的写照，而《红楼梦》则为曹雪芹家世的缩影……这显然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居然风行了千百年！

宋人反毛，有“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一类新发现，但正如阴法鲁先生所说：“对诗的评论也都是传统的说教”。如解释《关雎》一类具体诗篇时，仍从汉儒之说：（《关雎》）“盖指文王之妃大妣为处子时而言也”，（《葛覃》）“此诗后妃所自作”；（《卷耳》）“此亦后

妃所自作”……

清朝方玉润等人致力于《诗经》文学性的阐发，功不可没，但仍未摆脱汉、宋阴影。

第三，缺乏综合研究。由于年代久远，地理风俗迥异，名物训诂繁难，再加错误思想干扰，人们对 305 篇的认识、解释，一直属于线型思维，并不十分真切、准确。我举两个例子。

1、《齐风》中的《南山》、《敝笱》、《载驱》写文姜同其兄齐襄公通奸，《邶风·墙有茨》写卫惠公的母亲与惠公的庶兄公子顽（名义上是母子关系）私通，《邶风·新台》则写卫宣公霸占儿媳妇……这些事情，《左传》有载。如何分析这类“畸型”现象，现在一般的文学史本子和注释本都评论说：这是劳动人民揭露统治阶级的丑行，“扯碎他们的道德伪装，摧毁他们的精神优越感，促使人民对他们的腐朽本质有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他们的统治”，等等。分析至此结束，恐属“皮相”之论。

《诗经》反映的是奴隶社会的生活。奴隶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发展而来，也必然保留着原始社会的某些痕迹，恩格斯曾经指出：

摩尔根在这样追溯家庭的历史时，同他的大多数同行一致，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婚姻制度也在不断变化，但是原始婚姻制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它的历史继承性，所以在奴隶社会中遗迹仍然存在。

《列子·汤问》篇记载，西周时有个“终北国”，其社会风俗是“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周穆王北游过其国，三年忘归。既反周室，慕其国，怅然自失。”《淮南子·

本经训》也有类似记载：“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这些文字也许有“神话传说”之嫌，但《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无夫家者而会之”的记载，恐怕不能简单否定。《诗经》中《野有死麇》、《溱洧》等篇所写也与上述记载颇为吻合。这些资料可以证明：原始“乱婚”的习俗在奴隶社会中仍然有残留。

另外，卫惠公的母亲与卫惠公的庶兄公子顽婚媾一事，似乎不是男女双方有意或一方强迫另一方，而是社会压力（如“媒氏”之令）所造成。《左传》闵公二年记载此事曰：

初，（卫）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公子顽）
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载公、文公、宋桓夫
人、许穆夫人。

根据这段记载看来，那个“畸型”婚姻居然是女方娘家强迫而成，而且时间长达几年，一连生了五个子女。那个“畸型”婚姻决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那种偷偷摸摸，类似《雷雨》中繁漪与周萍之间的关系，似乎有着某种“合理”（风俗）性。因此，完全用现代人的习俗去看待上述诸篇，恐怕是不合适的，而必须实事求是，透过当时“国人”的歌声，去深入探索时代发展的轨迹，去细致研究两周之际的民情风俗。

十年前，我将这些想法教给一位应届毕业生，并且指导他研究这个课题。他认真钻研，读了40多本书，写了一篇题为《从〈诗经〉中的情歌看当时的社会风俗》的论文，结论是：在周代奴隶社会中，“既保留着原始社会风俗的残迹，又萌发着封建社会风俗的萌芽”，其基本特征是“朴野”。据说，这篇论文曾得到一些著名学者的赞赏。

总之，阶级斗争是社会生活的最重要内容，但决不是唯一内

容；只用阶级斗争而离开民情风俗等其它社会、时代内容来解释《诗经》中的作品，恐怕不会全面、中肯。

2、《周南·关雎》历来被看作“南方的作品”，甚至当代的学者如高亨、褚斌杰等，也这样一口咬定，几乎已是“金科玉律”。但一到具体解释时，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句中的“河”字，诸家均采取回避态度。决不是因为“河”字意义简单而忽略，而是因为“河”字的本义正好有力地推翻了他们的“南方诗歌”说。众所周知，“河”字在先秦时代是专用名词，即专指黄河，王力先生作过专门考证。宋朝朱熹比较老实，注意到“河”字乃“北方流水之通名”，所以尽管他为了附和汉儒“文王后妃之德”的说教而把“周”释为“岐周”，但他毕竟已经意识到《周南》中“杂以南国之诗”，即并非全都是“南国之诗”，实际上，他开始间接地承认《关雎》非“南国之诗”。

另外，《尚书·禹贡》有云：“九江孔殷”。孔颖达疏曰：“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如果《关雎》确为“南国之诗”，首句就应该改为“关关雎鸠，在江之洲”，而此诗从汉至今未见有第二个版本！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我曾作过专门研究，最后发现：此乃人们对古代地理不清有误所致。“周南”是个地名，有两个方位：

(1) 西周初年在陕西岐都，《诗谱序》中孔疏曰：

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歧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

其根据为《泰誓》和《乐记》。

(2) 平王东迁后在洛阳附近。《诗谱序》中孔疏曰：

平王以西都赐秦，则春秋时周公、召公别于东都受

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歧周之地。

《鲁》诗说：“古代周南即今之洛阳。”《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留滞周南”，《集解》注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阳。”

《周南》、《召南》中颇多江沱、汝汉之地名风物，说明二南之歌当于平王以后所采，其地域大约“北界河洛，南逾楚塞”。

那么，《周南》十一首诗中哪些靠近河洛，哪些出于楚塞？我读王安石《周南诗次解》受到启发。其“王者之治”的谬说当然不屑一理，但他提出十一首诗的“次序”、方位问题，却引起我极大重视。王氏认为《周南》诗的次序是自《关雎》而《麟趾》。《毛诗序》解释《周南》时说：周公之风（“王者之风”）“自北而南”。两者能够吻合。抛开封建说教，注意地理方位，再加“在河之洲”的内证，《关雎》属“河洛情歌”的真相也就显现出来，从古至今的“南方诗歌”说也就可以寿终正寝！

上边，我仅仅举了两个例子，而这样的问题在《诗经》研究过程中确实是不不少的。

总而言之，《诗经》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有它的贡献，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空白，今天我们需要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鉴别、总结。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诗经》学又是一门年青的学问。如果把《诗经》当成一部封建道德的教科书，如汉儒及历代封建文人所说的那样，那么，《诗经》就是一本“死书”，早就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但是，如果还《诗经》以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拭去蒙在那一幅幅生动的艺术画面之上的历史尘埃，那么，她那特有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就会如无价珍珠一样光彩绚丽，耀人眼目，就会超越漫长的两三千年岁月，仍可成为构建伟大高尚的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重要支柱之一，象希腊神话那样具有“永久的魅力”。

我说这段话，绝非空洞无物或纯属理论探讨：首先，《诗经》

中确实有许多篇章具有人性、人民性的内容，今天仍然可以激动我们，使我们感受到美，使我们在情绪上产生兴奋、愉悦、满足和充实，进而激起我们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高尚情操的理想和愿望。例如，《诗经》中有大量的爱情诗，《国风》160首，情诗的数量将近一半。扫去封建冬烘们抹在这些艺术珍品之上的重重垃圾，人们就会发现，青年男女爱情生活中的种种情况（忧喜得失，酸甜苦辣）在《诗经》中几乎都有表现，而总的基调则是淳朴、热烈、率真、健康。

《周南·关雎》写一位男子求爱失败，但决不沮丧，退却，而是坚定不移地去“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邶风·柏舟》写一位姑娘在爱情受到家人干涉时，呼天喊娘，大声疾呼：“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誓）靡它！”

《王风·大车》更是表现了青年男女勇敢、强烈、执着的爱情：“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岂不尔思，畏子不奔！”“活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

表现对爱人强烈的思念之情，则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等感觉。（《王风·采葛》）

描写青年男女幽期密约时兴奋与不安情绪的有：“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等等。

而《秦风·蒹葭》更是以其高妙的艺术手法，表现了一位痴情人所特有的那种似真不真，似假不假，扑朔迷离，可望而不可即的真实心态，从而抒发了对意中人的强烈爱情。

众所周知，真诚炽热的爱情，对于意中人的执着坚定的追求，既是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也是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真正的爱情，必定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使人欣赏执着的爱情，就能鼓舞人们去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就能净化人们的感情。今天，我们

仍然需要这样的爱情作品！

其次，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诗经》是奴隶社会生活的真实而又生动的反映。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秦典籍几乎全部付诸一炬。但《诗经》早就“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诵，冬夏之所教，莫之有异”，嘴上诵的，心里记的东西，是砍不下，烧不掉的。从这个角度说，《诗经》又有极高的认识价值，要了解奴隶社会的各方面生活情况，完全可以从《诗经》中找到不少资料。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这样做了，可惜还不全面。我举一例：

1987年，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遇见南京某大学一位教建筑史的学者，她向我抱怨，先秦建筑史方面的文字资料太少了。我翻过几本“建筑史”，先秦部分的资料确实少得可怜。看来，那位女学者的抱怨并非偶然现象。可是，《诗经》里边记载了不少建筑方面的知识，连鸡窝还有两种造法呢！《王风·君子于役》云：“鸡栖于埘”，“鸡栖于桀”此处“埘”，乃凿墙而成窝；“桀”是在木桩上作巢。《大雅·绵》中有云：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
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这四句诗说明，西周时代，人们盖房子就已经十分讲究“风水”。

俾立室家，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揀之陟陟，度之薨薨。
筑之登登，削屡冯冯。
百堵皆兴，鼙鼓弗胜。

.....

这 10 句诗是描述打土墙、盖房子的具体过程，有动态感，同考古发掘出来的静态的地下文物相比，不一样可贵吗？如果把类似这样的记载集中起来，难道不能为研究先秦建筑史提供真实而又宝贵的资料吗？

以上两点说明，《诗经》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选，其认识价值、审美价值，确实至今仍然十分巨大。

可惜这个艺术宝库，今天的利用率太低，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其重要原因就是研究没有跟上去。《国风》还好一些，对雅诗的研究，可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过去多少年只把她打入“另册”，说是“贵族文人之作”，是“封建性糟粕”，因此历来是块禁区，这恐怕是形而上学在作怪。我研读雅诗，有个看法：雅诗中除描写“宴飨”等内容的诗篇单调乏味、格调不高外，其他内容的诗篇，如“征人诗”、“讽刺诗”等，则都是十分优秀的，不仅思想内容不亚于风诗，而且艺术形式也相当不错。就“征人诗”而言，不仅数量比风诗中多得多，而且反映的生活面也要广泛得多，如以前解释《秦风·无衣》总是一个观点，说它表现了“爱国感情和英雄主义精神”；细读雅诗就会发现，这个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雅诗告诉人们，两周时代有一种风俗：“遣将帅及戍役，同歌同时，欲其同心也；反而劳之，异歌异日，殊尊卑也。”（《郑玄语》）“出而用兵，则均服同食，一众人也。入而振旅，则殊尊卑，辨贵贱，定众志也。”（王安石语）也就是说，《秦风·无衣》正好是反映奴隶社会中阶级对立的一个证据；另外，雅诗中的“刺诗”，不下 20 首，其讽刺揭露的生活面，广泛、深刻、政治性强，风诗中那些表象的揭露与此根本不能同日而异！

因为《诗经》是个艺术宝库，而开发利用甚少，亟需许多有志之士从事这项工作，所以说，《诗经》学又是一门年青的学问。

然而，建立新的《诗经》学，谈何容易！

首先，《诗经》一书从时间角度说，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长达 500 多年的样子；从空间角度说，西抵秦地，东至海滨，南及江汉，北探山西，上至王畿，下达属国，在这长远的时间和广袤的地域里，政治经济、民情风俗、语言心理、神话传说、历史掌故、艺术情趣，诸多不同，这为我们探索《诗经》这座迷宫增加了许多困难。

其次，旧《诗经》学如一座多年形成、杂草丛生的老树林子，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绕不开，难通过。说“绕不开”，因为里边确实有许多好材料足资启迪和可供参考；说“难通过”，因为许多谬说如枯藤蔓草纠缠着我们的思想，阻挡了我们的视野。因此，只有真正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用这把利刃来披荆斩棘，才能冲出“丛林”，踏上坦途。

第三，要想研究透彻反映整整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诗经》，必然涉及很多相关学科：文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音韵学……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全方位的知识，这就需要大量专门人才投入到这个事业中来。但在“海”潮汹涌、“金”光灿烂、知识贬值、斯文羞涩的环境中，要做到这一点恐怕是十分艰难的。

不过，要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潜力。我们是炎黄子孙，女娲后代，早在《诗经》之前，就已经出现过大禹、夸父这一类伟大形象。在《诗经》研究史上，多少人“皓首穷经”，尽管指导思想有误，研究方法陈旧，但是精神可嘉，令人钦佩。今天，我们不仅要用先进的世界观、方法论，对旧《诗经》学进行深刻的反思、鉴别，而且一定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为人民的利益，研究好《诗经》，让这座瑰丽的精神宝库，重新焕发出灿烂的艺术青春！